

这是我第二次写这个题目。

濠上漫与

前一次写在二十年前,1997年夏初,应天津《今晚报》之约。他们要开博导专栏,我前一年刚跻身其间,于是冒昧写了千余字。当时看法较简单,认为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,清编《全唐诗》存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又一千五百五十五句,做一番加减法,应可知道存世唐诗的大体数字。

所谓减法,一是指《全唐诗》因体例不善而引起的重复收录,如乐府诗既据《乐府诗集》收在书首,又在各人名下收存,谐谑、诗词也有不少重收;二是指同一首诗分别收录在二或三人名下,不免重复统计;三是唐前五代诗多有误收。三部分合计,大约要减去四千首左右。

所谓加法,则指从乾隆末开始之各家唐诗补遗,至今大约已超过八千首。加减合计,保守估计约是五万三千首,最多是五万四千首。我近年又有许多新的所得,但总数肯定还无法超过五万四千首。

近年来发愤重新全部校录唐诗,所得之丰,远超想象。照理说,具体数字应越来越清晰,我以往也一直这样认为。然而越是接近定稿,我越发迷茫,于是想借本文将这些迷茫写出。

习惯所说一首唐诗,是指保存完整、题目和首尾完具的一首作品,多数情况下应该不会引起误解。但如果我借这几个字说事,其实很难明确界定。

先说唐,任何人都知道唐之立国在618年唐高祖开国,907年唐亡于后梁。但唐诗的时间则并不限于此。明清两代,都认为五代是唐的余闰,《全唐诗》包括唐

存世唐诗知多少

■ 陈尚君



清康熙版《全唐诗》

五代十国的所有诗作。那么问题来了,前后截止期,都是全国人民共同跨过新时代,就要有具体的限定。从隋入唐者,前后都有作品者大约二三十人,涉及诗作不足百篇;五代十国入唐者,因各地域归宋时间不同,入宋前后存诗较多,现在的一般办法是存数不多者两边都算,入宋诗作较多者如徐铉、李昉,仅存入宋前作品,对读者当然不太方便,但为避免滥收,又只能如此。

清编《全唐诗》所收,原则上无论所据书之早晚、真伪、完残,凡相沿为唐人诗作一概收入,造成许多误讹。今人手段发达,考证精微,几乎每首诗或每个诗人之生平都调查清楚,结果大跌眼镜。比如“秋风万里芙蓉国”作者谭用之,

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作者翁宏,以及围绕翁宏的十来位诗人,历来视为五代人,今知可能出身于五代末,但他们所有事迹和作品,都在宋初。两《南唐书》有传的邵拙,今知其应考在咸平间,南唐之灭亡已二十多年了。这些还算能弄清楚。更糊涂的是,唐代的传奇志怪,宋人喜欢继续添油加醋地编造。顾况落红流诗,已很难相信,宋人再敷衍出于佑与韩氏的类似故事;王轩西施石故事,宋人也继续编造两人幽会后的调情诗作。元明两代,造伪更蔚成风气,唐五代女诗人,大约三分之一是假托的。我还发现一有趣情况,宋人说到好诗而忘作者,就号称是唐诗,逐一查检,大多可以理清。凡此之类,累加就涉两三千首之多。

再说何者为诗。我们习惯说《诗经》、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,但从六朝文体说兴,严辨诗文界限,一是骚体的韵文皆属文而不算诗,二是四言的韵文如赞、铭、箴、颂皆归文而不归诗。这些已不存在争议,虽然也有人试图改变,采纳必招争议。大端之问题在于佛道歌诗,习惯上僧人之个人诗作多称偈颂,道士之什《全唐诗·凡例》称章咒,准确还是称歌诗赞颂为好。康熙帝不喜欢此类作品,一句“本非歌诗”,将胡震亨辛苦搜罗的包括王梵志诗歌在内的大批作品皆排除在外。近百年因敦煌遗书中大量民间及僧道俗曲礼赞类作品之发现,在收录体式上学者大多已接受从宽采录的态度。当然宽到什么程度,仍很难把握。

还要说到什么是一首。最简单的问题在处理一代文献时,常会非常复杂。比如贺知章的两首《晓发》,其一云:“故乡杳无际,江皋闻曙钟。始见沙上鸟,犹埋云外峰。”其二云:“江皋闻曙钟,轻棹理还舫。海潮夜约约,川露晨溶溶。如见沙上鸟,犹霾云外峰。故乡杳无际,明发怀朋从。”其一四句均见于其二,但排列不同,构成了新的诗境。还有这首:“野人不相识,偶坐为林泉。莫漫愁沽酒,囊中自有钱。回瞻林下路,已在翠

微间。时见云林外,青峰一点圆。”以前四句独立成篇者唐代就流传很广。类似情况还有王湾《江南意》和《次北固山下》之前后属稿之不同。以上几例应皆属于作者自改或再创作的例子。至于后人割裂诗篇,如李绅与裴度、刘禹锡、白居易合作《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》长诗,《全唐诗》沿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之误,将李绅三节作为《和晋公三首》又将裴度联句割为《喜遇刘二十八》《送刘》《再送》,一首诗截成了六首。再如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五言卷二一收萧颖士《重阳日陪元鲁山登北城留别七首》,在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三四、《唐诗纪事》卷二一皆作古诗一首,也被割成了七首。

举以上例子,是要说明唐诗流传千年,歧互传误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清编《全唐诗》成书仓促,不能充分考证鉴别,又所承袭胡、季二书,囊括明代所传唐诗的所有文本和错误。我从1981年起作唐诗搜罗考证,又恰逢时代风会与学术转型,得以半生经历肄力于此,所得之丰,超迈前贤。年齿渐增,思有以作集大成之工作,以嘉惠学界,且以求真祛伪、求全备录为目标。进行多年,完成可期,略布所怀,亦求益于有识者。

明眼的读者可以体会,我的题目借用了孟浩然诗“花落知多少”的句式。孟浩然当年感叹流年,见夜来风雨,满地落红,感慨良多。虽然惜春之逝,但他绝不会去数一下园内落花几何。同理,我们大约估计唐诗今存数在五万三千首上下,绝对可靠者大约略过五万首,也就够了,再求准确,就不免泥沙俱下了。

(上接第一版)

《天演论》初版于1898年,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;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也是1899年福州的私家初刻本。这两部译作迅即出现各种版本,各家出版社竞相印发,由是更风靡一时。但是,很快严、林与商务印书馆签约,从1903年起,两人的译作皆由商务出版。1904年,推出了严复的《原富》《群学肄言》《群己权界论》《社会通论》和《法意》,次年《天演论》铅印本问世。林纾也是一样,1903年之后十数年里,共出版了林译一百四十种,大多收入《说部丛书》和《林译小说丛书》。商务为严、林提供经济上的保证,而从出版、营销到传播都是极其高效的。

这一切,造就了严、林的传奇,也造就了商务的传奇。而在这一切的背后,站着一位商务的关键设计师——张元济。

1896年,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任职,处理涉外文书工作,由此树立了放眼世界传播西学的志向。次年,他创办通艺学堂,鼓吹西学,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。英文教师严君潜是严复的侄子,严复为学堂取名,也在学堂作过讲演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张元济受到“永不叙用”的处罚,南下至上海,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,与严复书信往来频繁。严在一封复信中说:“译书为当今第一要务”,代表了两人的共识。此时,严已翻译《原富》,准备交给张在译书院出版。1902年,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,次年担任编译所所长,即将严译纳入出版计划。

同样因受欧美风雨文化复兴的风气感召,林纾从事小说翻译。如《斐洲烟水愁城录》的序文说:“敦喻诸生,极力策勉其

恣肆于西学”,“欧人志在维新,非新不学,即区区小说之微,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,斥去陈旧不言。若吾辈酸腐,嗜古如命,终身安知有新理想耶?”因福建同乡之故,林纾与高梦旦相熟。高也是商务的重要人物,继张之后担任编译所所长。1903年,商务出版的第一本林译《伊索寓言》,其口译者即严复的侄子严君潜。这么看来,高梦旦与严复、张元济也都有关系。

甲午之后中国进入现代转型的进程,在外海频仍、国族危机的激荡下,革命运动与保守势力此起彼伏,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此刻的张元济、严复和林纾走在一起,站在中西文化交通的前沿,怀着拥抱世界的激情,迎着希望的曙光,决心为翻译与出版事业开创新的文化空间。然而,回到上世纪初,把翰林张元济、举人林纾和新式学堂出身的严复连结在一起的历史节点,可以发现,他们面临着一种新的人生抉择而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之途,其输入西学的共同志业更受到“教育”这一理念的驱动。当商务的创始人之一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商务时,张自述:

光绪戊戌政变,余被谪南旋,侨寓沪渎,主南洋公学译书院,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。继以院费短绌,无可展布,即舍去。夏君招余馆任编译,吾与约: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。夏君诺之。

的确,张元济信守自己的诺言。1904年,他致函汪康年曰:“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,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。平心思之,视沉浮郎署,终日作纸上空谈者,不可不为高出一层也。”事实上,当时清廷打算起用张元济,不久正式召张进

京起复原官,他也应召,然而在官中三个月即告假回到上海,继续在商务追求与实践他的教育理想。

因此,张元济、严复和林纾不待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,已完成自身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折,为国民前途殚精竭力。他们也看准了商务印书馆在国民教育、都市文化方面的发展潜质。确实,正如后来所证明的,他们在中国翻译史、思想史、文学史、教育史和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,厥功甚伟!同样,商务也成为严、林的安身立命之所。严复能“屏绝万缘,惟以译事自课”,与其著作所带来的可观收益是分不开的,至其晚年基本上由稿酬、版税和在商务的股份得以维持。林纾不仅是他的译作,包括文集,皆由商务出版,如高梦旦的《畏庐三集》序言所说:“畏庐之文,每一集出,营销以万计。”以致有人戏称林纾的书房为“造币厂”,因其“动辄得钱也”。

严、林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巨大影响,我们耳熟能详。《天演论》发表之后,“物竞天择”、“自强保种”等话语不脛而走,而“进化”一词更成时人的口头禅。我们似乎不太关注“进化”思想在日常生活与都市文化方面的表现。民初郑曼陀画的一幅月份牌美女图里,一个时装美女在阅读《天演论》,背景是浩瀚的海面。其时,“时尚”和“进化”有相通之处,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无袖露肩、高开衩的旗袍,表明女性身体更为自由开放的观念。有“通俗之王”之称的包天笑最富进化思想,由商务出版、他主编的《妇女杂志》中就不乏《进化学上之妇人观》之类的文章,涉及感情及其表述的历史变迁。也正是包天笑,在1917年1月创办的

《小说画报》中声称“盖文学进化之轨道,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”,该杂志由是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份专刊白话小说的杂志。

二十世纪中国义无反顾地朝现代化迈进,时代风云瞬息变幻,大浪淘沙,潮起潮落,而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,保持而且不断更新其出版传奇。今天的青年读者可能对《天演论》或《茶花女》产生隔膜,而且我们也知道,严复和林纾曾在政治上文学上一度非常保守,成为时代的落伍者。但对于商务来说,这两人不仅是品牌,更是一种可贵的传统,闪烁着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。

“严译”、“林译”是商务特铸的品牌符号,不仅使我们勿忘初衷地回望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时刻,同时也成为一个通过翻译把世界文明转化为国粹美文的比喻。翻译,意味着文化并存、包容、选择而最终转化为中国特色的文化果实。

1923年,商务首次出版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排印本,“林译”得以完帙;1930年重新命名《严译名著丛书汇编》,更确定“严译”的经典性。古语说“慎终追远”,时至上世纪三十年代,善始善终地对待严、林的著作,对商务来说,这两位文化巨匠在文化河床中光景常鲜,是活的传统的代表,而藉以建构、开拓和更新自身传统,不仅是其出版产业的生命标志,也是中西合璧新旧兼备的文化方向的体现。

值此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庆典之际,就商务与严、林关系略述所知,藉此向前贤表达崇仰之情,也对商务的璀璨前程表示衷心的祝愿。